

古越语视野下的“朱方”“丹徒”地名释义

高逸凡

[提要] 本文从古越语的角度出发,通过相关汉字上古音与侗台语族词汇语音的比较,结合镇江历史地理事实,指出“朱方”“丹徒”应是古越语地名的汉字记音,分别意为“主管江岸的官守”和“控扼江河的城关”,其内涵与后世出现的汉语地名“镇江”一脉相通。

[关键词] 古越语 侗台语 镇江 吴越文化

一 引言

“朱方”“丹徒”是江苏古城镇江最早见诸文献史料的两个名称^①,前者是吴越地区最早出现的县制城邑名,而后者则是秦一统以来当地使用时间最长的县级行政区域名,至今仍然为镇江市丹徒区所沿用。

“朱方”始见于《左传》记载的鲁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吴子齐庆封朱方”事(杨伯峻 1981:1149);鲁昭公四年(前538年)楚伐吴,使屈申克朱方,“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杨伯峻 1981:1253);《吕氏春秋》和《史记·吴太伯世家》也记载有吴、楚、齐围绕“朱方”展开的这段历史(许维通 2009:603;司马迁 1959:1452、1459-1460),其中《史记》的记载首次提到了“朱方”之县:

吴子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司马迁 1959:1452)

此处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吴地记》注曰:“朱方,秦改曰丹徒。”案刘宋以前流传的《吴地记》以西晋张勃所著最为知名(刘响等 1975:2014;陆振岳 1986),故知“丹徒更名自先秦之朱方”大约在六朝早期以前已是一定社会范围内的常识,而六朝以来“朱方”也常被用作镇江一带的古称(刘建国 1987;石奕龙 1993)。个别学者认为“朱方”应在河南房县或安徽凤阳(钟离),然其直接证据终不及“丹徒”说充分(刘建国 1987;石奕龙 1993),不足以推翻成说。

“丹徒”始见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的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保于江南丹徒”事(司马迁 1959:2076),《汉书·地理志》载其为会稽郡属县(班固 1962:1590-1591),东汉顺帝时吴郡自会稽郡分出,故西晋司马彪《郡国志》载“丹徒”为吴郡属县,梁刘昭注云“春秋曰朱方”(范晔 1965:3489-3490)^②。吴嘉禾三年(234年),丹徒县改称武进县,晋

^①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谭其骧 1982:17-18)显示,镇江东部在西周时期还有一地名“宜”。这一名称来源于镇江大港烟墩山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宜侯矢簋”,属于出土金文史料中的地名(李学勤 1985)。但是,“宜”是否就在镇江一带,目前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钱公麟 2016)。故本文讨论不涉此。

^② 今本《后汉书》中《郡国志》实为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附入。

太康三年（282年）复改为丹徒县（沈约 1974:1039）。此后除隋改丹徒县为延陵县（刘昫等 1975:1583）、南京国民政府改丹徒县为镇江县（镇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103）外，“丹徒”作为本地县级行政区域的名称基本没有较大变化。

一处地名在形成时往往与当时当地的时代特色、空间特色、社会特色、族群特色、文化特色等历史信息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地名的释义对于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地名“朱方”的释义，历代文献并无明确记载。刘建国（1987）由“方”字联想到商代“徐方”“虎方”“危方”等众多的方国名，认为“朱方”即是这类商代方国地名在春秋时期的子遗；肖梦龙（1988:21）进一步认为“朱方”原本应是“矢方”，即宣侯矢簋铭文中名“矢”的方国，由“矢”而“朱”是“音似形近”之讹。

关于地名“丹徒”的释义，最早出现在南朝时期的地志之中：

《南徐州记》云：秦使赭衣凿其地，因谓之丹徒。（司马迁 1959:2077）^①

《京口记》曰：龙目湖，秦王东观，亲见形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湖中长冈使断，因改名丹徒，今水北注江也。（徐坚等 1962:141）^②

后世文献由此因袭、层垒，始终没有突破这一传说色彩浓厚的解释框架：

始皇三十七年，使赭衣徒三千，凿京岷东南堑，故名丹徒。（俞希鲁 1999:3）

《地理志》言：“秦时望气者云其地有天子气，始皇使赭衣徒三千人（原注：一作二千）凿坑败其势，故更名丹徒。（何绍章等 1991:56）

然而春秋时期的“朱方”距离商代已经非常遥远，同时期也没有其他的“方”国见诸记载；“矢”与“朱”古音不似，金文不近，谓“朱方”即“矢方”更未免牵强；至于“丹徒”若因“赭衣徒”而得名，为何不名“赭徒”而另取“丹”字？这些关于“朱方”“丹徒”地名的释义，基本都是后人从汉字字面意思出发的推测或附会，未能切中问题的肯綮。

从考古学文化上看，镇江一带在先秦时期属于吴越文化区（郑小炉 2007:1），当地的主要居民是“习俗同，言语通”（许维遹 2009:628）的吴人和越人，二者都属于古代“百越”民族的范畴（吴春明 2008:23-27），所操语言应属于侗台语族的古越语（郑张尚芳 1999）。“今吴语区在秦汉时代，广大的乡野仍是百越所居地，其语言为越语，并非汉语方言”（游汝杰 2018:301），且百越民族的人口至少在孙吴时期以前仍占江南居民的多数（潘悟云 2017:83-86）。因此我们在探讨镇江地区先秦乃至秦汉时期出现的古地名涵义时，不可不考虑当地吴越居民所操古越语的因素，正如宋代以后随着壮汉杂居地区的增加，广西开始出现用汉字音记载的当地壮语地名一样（王法辉等 2013）。张敏（2018:46）提出“对于音译的吴国地名，可音训而不可义解”，这一认识大有见地；然而将“朱方”“丹徒”都解释为“句吴”的不同音译（张敏 2014），在音韵学上并没有给出更令人信服的论证^③。郑张尚芳（1990，1996）通过汉字上古音与侗台语族亲属语言词汇的比较研究，从古越语的角度对“盱眙、余杭、夫椒、姑苏、会稽”等吴越地名进行了较为合理的释义，这对我们探究“朱方”“丹徒”

^① 此处是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引佚书南朝《南徐州记》文字，见于《史记》（点校本）注文中。

^② 此处是徐坚等著《初学记》所引佚书南朝《京口记》文字。

^③ 其文称“‘朱方’与‘句吴’声同韵转”“见端旁纽，丹徒与句吴声近韵同”。且不论章母三等与见母一等的关系，此处将二字地名全部反切为一音来比较声韵的作法未免过于冒险，而“旁纽”谓同组声母则可，见、端属异组声母，也并无“旁纽”“声近”可言。

二地名的涵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 “朱方”释义

吴越地区多齐头式地名，如“余杭、余干、余姚”“姑苏、姑孰、姑蔑”等。这些地名的涵义大多与古越语有关，“齐头”的现象亦是侗台语名词修饰成分后置的语法特点造成的，如“余”在词首时可通作“地”解，“余杭”即意为“搁浅之地”，“余干”即意为“干越人的田地”之类（郑张尚芳 1990, 1996）。同样，“朱方”词首的“朱”字，如果从吴越齐头式地名的角度来看，很可能与“朱余”的“朱”字有着相同的涵义，而“朱余”的古越语释义在东汉时期成书的《越绝外传记地传》中早有记载：

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去县三十五里。（李步嘉 2013:228）

“朱余”意为“盐官”，而“余”是古越语“盐”之意，按照侗台语名词修饰成分后置的语法习惯，“朱余”中的“朱”字就极有可能是古越语“官”一词的音译。郑张尚芳（1990）援引傣语 $t\tau au^1$ “头人”与“朱”字的上古音拟音 $*tjo$ 进行比较，认为“朱”是古越语中“主管”一词的记音。而傣语中意为“头人，主人”的 $t\tau au^1$ 一词，其音译汉字多作“召”或“岛”，曾是傣族土司的专有称谓，亦是傣族贵族第一大姓“刀”姓的来源（吴东海 2011）。结合以上材料判断，将“朱余”词首的“朱”字解释为古越语中表示主管某事之“官”这一语素的音译，是较为合理的。既然如此，参照吴越齐头式地名的命名规律，“朱方”词首的“朱”字也有充分的理由作同样的解释，剩下的问题就是“朱方”所“朱”之“方”所指何事了。

“方”字上古音属阳部，帮母或並母，拟音作 $*paŋ$ 或 $*baŋ$ （郑张尚芳 2013:316），可与侗台语“河岸”一词的读音相对应。侗台语“河岸”读音如表 1 所示：

表 1 侗台语“河岸”一词的读音^①

原始侗台语拟音	标准泰语	布依语	越南傣语 (越南保安县)	南部壮语 (广西上思县)	石家语 (Sack)
$*hwaŋ^B$	$faŋ^{B1}$	$paŋ^4$	$phaŋ^{B1}$	$phaŋ^{B1}$	$vaŋ^{B1}$

壮语中读音同为 $paŋ^4$ 的“bangx”一词还有“像墙一样直立的石山”之意，对应汉语的“壁”（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壮汉英词典》编委会 2005:48）。

镇江东部丹徒镇至大港镇五峰山一带在先秦时期是长江入海口的南岸，沿岸一线皆是宁镇山脉的群山丘陵，因为河岸边界条件优良，至今本段长江南岸的岸线仍与先秦时期基本一致（曹光杰等 2006）。而这一线山脉的高处或山麓之上，就分布有大量西周春秋时期吴文化的台型遗址和高等级土墩墓（刘树人等 2006:80-84）。对于当时的吴人来说，此地以东就是茫茫东海，此地由群山丘陵构成的江岸或海岸正如同天然的城墙壁垒一般，即壮语的“bangx[$paŋ^4$]”，是吴国能够专心向太湖流域腹地发展的关键屏障。在此后的历史中，镇江也因为这一凭江临海的丘陵地势而号称“浙西门户”，可“内控江、湖，北拒淮、泗”，为“三

^① 表中“布依语”一项见周国炎（2011:7、60）“baangxdah”“dah¹”条，依原文用数字标调类；其他诸项见 Pittayawat Pittayaporn（2009:334）“river bank”条，依原表用 A、B、C、D 分别表示与中古汉语平、去、上、入四声对应的四个调类，后加 1、2 区分其清、浊源流。

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顾祖禹 2005:1248-1249）。春秋晚期，吴国主要军事力量长期在太湖流域与越国争锋，镇江一带的沿岸防御就显得尤为重要，吴国在此地设置主管岸防的官守及其城邑是合乎情理的。

综合以上语言学、地理学和考古学材料判断，“方”字在“朱方”这个地名中应当解释为古越语中“河岸”一词的汉字记音。因此，“朱方”按照其上古汉字音对应的古越语词应释作“主管河（江）岸的官守”之义，可译为“堤官”，与“朱余”之译“盐官”相仿。由此再重新审视历史，就能发现吴国将庆封封于“朱方”的举动的确具有捍御身后之敌的意味。

三 “丹徒”释义

“丹徒”词首位置的“丹”字，上古音属元部，端母，拟音作 *ta:n（郑张尚芳 2013:298），其同音字“单”（郑张尚芳 2013:299）曾在越王勾践《维甲令》的汉文记载中被用来音译古越语中的“堵”一词：

越王句践反国六年，皆得士民之众，而欲伐吴。于是乃使之维甲……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菜。菜，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李步嘉 2013:85）

对此，郑张尚芳从《说文》所载上古“堵”字原义（“垣也，五版为一堵”）出发，以泰文中“硬块版”“关隘”“抗敌”三词的读音作参照，指出这里的“单”字应当是与其上古音对应了古越语中表“城垣关隘”义的词汇（郑张尚芳 1999）。因此，根据吴越地名词义中心语成分前置的特点，与“单”字同音的“丹”在“丹徒”这一地名中很可能意为“某城”或“某关”，而这个“某”则与“徒”字的涵义有关。

从侗台语语法出发，“徒”字在“丹徒”一词中属修饰成分，其上古音属鱼部，定母，上古后期拟音（秦汉音）作 *da:（郑张尚芳 2013:261、483），此音与侗台语“河川”一词的读音十分契合，见表 2（Pittayawat Pittayaporn 2009:334）：

表 2 侗台语“河川”一词的读音

原始侗台语拟音	*da: ^B
标准泰语	tha: ^{B2}
越南傣语（越南沙坝县）	ta: ^{B2}
越南傣语（越南高平市）	ɗa: ^{B2}
南部壮语（广西龙州县）	ta: ^{B2}
南部壮语（广西上思县）	ta: ^{B2}
热依语（Yay）	ta ^{B2}
石家语（Saek）	tha: ^{B2}

秦汉时期的丹徒县位于长江入海口南侧，其地理位置很可能还与一条早期运河水道有关：

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萧子显 1972:246）

在存世文献中，元代《至顺镇江志》最早将“秦使赭衣三千凿丹徒”的传说与“丹徒水道”及大运河的开凿联系起来，称“秦凿丹徒、曲阿，齐通吴会，隋穿使广”，其理由是“今

水道所经大小夹冈，一在京岷之南，一在云阳之北，其势委曲周折，皆凿山为之”，正与“秦使赭衣徒三千凿京岷东南堊”“秦凿云阳北冈”诸说相合，并有宋人诗句“自从秦凿兴赭徒，大业广此事邀娱”为证（俞希鲁 1999:277-278）。虽然此说是从间接证据^①和感性认识出发形成的推断，以论证逻辑来看并不严谨，但南朝史书对于“丹徒水道”的记载也使我们无法排除其在秦汉时期就已存在的可能性：1980年，在镇江古运河畔的丹徒镇金家山西汉早期墓葬中曾出土过一枚“丹徒右尉”铜印，系秦汉时期大县长吏官印（肖梦龙、戴志恭 1983），而丹徒镇（今丹徒社区）坐镇镇江城市东南的古运河入江口，历史上即为汉丹徒县治所在：

《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润州丹徒县东南十八里，汉丹徒县也。《晋太康地志》云：‘吴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杀之于此城南’……”（司马迁 1959:2077）

总之，无论是长江入海还是“江河交汇”，“丹徒”此地都与“河川”有着密切的联系。结合汉语上古音来看，“丹徒”地名中的“徒”字应是古越语中“河川”一词的记音字，而非“赭衣徒”这种字面意义上的“徒”。由此再结合“丹”字的“城垣关隘”之意，则“丹徒”这一地名在古越语中应是“河川之城”或“河川之关”的意思，对其义加以引申就是“控扼江河的城关”，汉语可译为“江城”“河关”之类。这一古越语视野下的地名释义不仅与秦汉丹徒县城（今丹徒社区）坐镇古运河入江口的地理位置相吻合，更与后世出现的汉语地名“镇江”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四 结 语

从先秦时期的“朱方”到秦汉时期的“丹徒”，这两个地名从字面上看，可谓毫无联系。然而在古越语的视野之下，从主管江岸的“堤官”到控扼江河的“江城”，其内涵竟又如此相通，从源头上清楚地揭示了镇江这座城市古今一贯的地理意义——屏障太湖的吴越门户，锁钥江河的天下关津。

史载吴王刘濞中原兵败之后退保江南“丹徒”，此地尚有东越王率领的越军万余人。东越王封地在东瓯之地（今浙江温州一带），响应吴王起事发兵，却只屯驻于“丹徒”，不曾渡江北上助战，未必没有控此“江城”“河关”观望天下，必要时以吴越之境自保的想法。而事情的结果也的确如此：汉军没有选择渡江南征，而是通过收买东越王借刀杀死了刘濞，东越王因此免除了罪过，得以全师归国（司马迁 1959:2834、2980）。“丹徒”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就证明了自己的名副其实。

我国中原以外地区的古代地名往往保留了许多历史上当地居民语言的痕迹，这就使得从字面意思出发对其进行的释义经常不得要领，留下了许多附会敷衍的地名传说。而从历史上当地居民语言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地名的历史读音时，我们却有机会获得更为贴近当地自然环境或风土人情的解读。正如“朱方”“丹徒”以古越语译作“堤官”“江城”恰与汉语的“镇江”一脉相通，这是仅靠汉字的音韵、训诂无法进入的认知领域，却与历史上当地居民简单朴实的生活世界紧密相连。当我们由此接近这些地名真正的内涵时，就能更加清楚地读懂它们在各自的一方山水间所扮演的人文角色。

^① 见前文所示南朝地志的记载。

参考文献

- [1] 班 固. 1962. 《汉书》(点校版), 北京: 中华书局.
- [2] 曹光杰、王 建、屈贵贤. 2006. 《全新世以来长江河口段河道的演变》, 《人民长江》第 2 期.
- [3] 范 晔. 1965. 《后汉书》(点校版), 北京: 中华书局.
- [4] 顾祖禹. 2005. 《读史方輿纪要》(点校版), 北京: 中华书局.
-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壮汉英词典》编委会. 2005. 《壮汉英词典》,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6] 何绍章、冯寿镜、吕耀斗等. 1991. 《光绪丹徒县志》(影印版),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 [7] 李步嘉. 2013. 《越绝书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 [8] 李学勤. 1985. 《宜侯矢簋与吴国》, 《文物》第 7 期.
- [9] 刘建国. 1987. 《朱方考》, 《镇江师专学报》第 4 期.
- [10] 刘树人等. 2006. 《镇江地区吴文化台形遗址及土墩墓分布规律遥感研究》, 载王玉国等编著《镇江吴文化研究》第 75-86 页,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 [11] 刘 昉等. 1975. 《旧唐书》(点校版), 北京: 中华书局.
- [12] 陆振岳. 1986. 《苏州旧方志概述》, 《苏州大学学报》第 4 期.
- [13] 潘悟云. 2017. 《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兼论汉语南部方言的形成模式》, 载陈忠敏、陶寰编选《吴声越韵》第 81-98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4] 钱公麟. 2016. 《从〈宜侯矢簋〉谈起》, 《苏州文博论丛》(总第 7 辑) 第 30-33 页,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15] 沈 约. 1974. 《宋书》(点校版), 北京: 中华书局.
- [16] 石奕龙. 1993. 《“朱方”辩》, 《东南文化》第 1 期.
- [17] 司马迁. 1959. 《史记》(点校版), 北京: 中华书局.
- [18] 谭其骧. 1982.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北京: 地图出版社.
- [19] 王法辉、王冠雄、李小娟. 2013. 《广西壮语地名分布与演化的 GIS 分析》, 《地理研究》第 3 期.
- [20] 吴春明. 2008. 《“自交趾至会稽”——百越的历史、文化与变迁》, 载车越乔主编《越文化实勘研究论文集》第 23-34 页,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21] 吴东海. 2011. 《傣族人名的命名方式和文化功能》, 《百色学院学报》第 6 期.
- [22] 肖梦龙. 1988. 《吴国的三次迁都试探》, 载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编《吴文化研究论文集》第 14-32 页,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 [23] 肖梦龙、戴志恭. 1983. 《镇江博物馆藏古代铜印》, 《文物》第 8 期.
- [24] 萧子显. 1972. 《南齐书》(点校版), 北京: 中华书局.
- [25] 徐 坚等. 1962. 《初学记》(点校版), 北京: 中华书局.
- [26] 许维通. 2009. 《吕氏春秋集释》, 北京: 中华书局.
- [27] 杨伯峻. 1981. 《春秋左传注》, 北京: 中华书局.
- [28] 游汝杰. 2018. 《吴语方言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29] 俞希鲁. 1999. 《至顺镇江志》(点校版),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 [30] 张 敏. 2014. 《鸿兹新证——兼论西周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性质》, 《东南文化》第 5 期.
- [31] 张 敏. 2018. 《吴越文化比较研究》, 南京: 南京出版社.
- [32] 镇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 《镇江市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33] 郑小炉. 2007. 《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34] 郑张尚芳. 1990. 《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份》, 《民族语文》第 6 期.
- [35] 郑张尚芳. 1996. 《古越语地名人名解义》,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 4 期.
- [36] 郑张尚芳. 1999. 《句践“维甲”令中之古越语的解读》, 《民族语文》第 4 期.
- [37] 郑张尚芳. 2013. 《上古音系》(第二版),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38] 周国炎. 2011. 《布依—汉词典》,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 [39] Pittayapom, Pittayawat. 2009. *The Phonology of Proto-Tai*.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lace Names *Zhufang* 朱方 and *Dantu* 丹徒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cient Yue Language**

GAO Yif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two ancient place names *Zhufang* 朱方 and *Dantu* 丹徒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cient Yue language.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the Old Chinese sound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two place names with sounds of correspondent Kam-Tai words, and with the facts of Zhenjiang's historical geography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Zhufang* and *Dantu* are two ancient Yue place names transcrib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meaning respectively “the official in charge of coastal defense” and “the pass for river defense”, being intrinsically the same with the place name Zhenjiang in Chinese which emerged later in history.

[Keywords] ancient Yue language Kam-Tai languages Zhenjiang Wu-Yue culture

(通信地址: 212013 镇江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